

# 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

笑 冬

内容提要:农村工业化涉及到一系列对妇女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设置。第一个方面的设置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从世界的经验来看,19世纪的工业革命把生产功能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妇女的劳动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从此性别的不平等从隐性、个人性,走向了显性、社会性。

第二个方面的设置来自中国的经验,即支撑工业积累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制度。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绝对剩余价值的扩张性积累”到改革开放后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深入性积累”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它使得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第一次在本社区普遍实现了工业就业,工资就业。

第三个方面的设置是以血地缘为基础的社区劳动力市场。这种劳动力市场曾经以实现社区的相对完全就业和推动社区发展为目标,并保护社区工人不受外来竞争的威胁。在亲属、邻里关系和教育、技术背景这两个旗鼓相当的就业条件之间,早期的社区劳动力市场显示了相当的宽容性,它没有因为妇女的第二个方面的不足而把她们排除在外,而是给了她们实践和发展的机会。90年代后期农村工业企业的全面转制使“节资降本,加速资本化”的社区劳动力市场不再对妇女宽容。中年妇女的失业被内化,现实化了。同时,男性农民通过“户平等”捍卫了他们的平等理想和性别等级制。

孤立地谈性别平等是谈不清楚的,要把它和其他种类的社会平等问题进行对照,还要把它置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来分析。妇女与中国农村工业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 一、工业革命使性别不平等从隐性、个人性 走向显性、社会性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基本上可以归入三大范畴: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它们概括了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延续最长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之所以能够延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可以被利用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市场经济最富有生机,同时又常常是十分冷酷的机制之一,就是顽强地寻找廉价劳动力:付低工资,赚高利润。谁最有可能成为理想的廉价劳动力呢?那就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穷人、农村人、妇女、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的老百姓。但是,压低劳动力价格和推动经济发展并不总是成正比,常常成反比,而且是破坏性的。市场萧条可能是由于生产不足,就像60年代的中国和苏联,货架上商品有限,甚至是空的。其主要原因不在消费生产能力上,而是投资重点过于倚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市场萧条也可能是由于生产过剩。所谓

生产过剩并不真的是商品多得消费不掉,而是消费者购买力不足。劳动者工资低,无力购买商品,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30年代初以及后来历次的大萧条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从而创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痛切的教训,尽管形式不同,但道理是相通的。重要原因之一,用简单的政治经济学语言讲,就是没有解决好积累与消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用社会学的语言讲,是没有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相对协调平衡。

把性别不平等并列于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性别的不平等不仅牵涉到世界一半的人口,而且比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复杂得多,因而深化了我们对不平等的理解。我想通过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第一,现在很少有人公开说:某某民族是天生的劣等民族。但说“女人生来就不如男人”、“养孩子做家务是女人的天职”还大有人在。原因之一是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确实存在差别。但这种生理差别,诸如体力、耐力、思维能力等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究竟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化和“内化”的结果,大多数男人一般不会去考虑,大多数女人也说不清。“内化”的意思是说,当事人把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定全盘接受下来,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定。第二,性别不平等无法与男女的亲密关系(爱情和性)以及共同生活的基本依托(家庭)分开。下层阶级和弱势民族对不平等会有强烈的感受和抗争,但性别不平等不一定导致类似的结果。一个傍大款的年轻女人可能自我感觉很幸福,尽管别人把她定义为没有名分的“包二奶”。一个经常挨打的农村妇女对丈夫的赌博、酗酒很不满,但她还是要和这个男人厮守一生。第三,社会对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性别不平等的重视,因为后者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前两者则不同,贫富差别太大,失业工人太多,少数民族上街游行,政府就紧张,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妇女作为社会群体很少为性别不平等采取激烈的社会行动。这首先要“归功”于“家庭”这一社会设置(social institution)。也就是说,女人有退路,家庭这个“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被看成主要是女人的领地。丢了工作就回家,让男人养。女人通过家庭被个体化了,被隔离了。男人则不同,男人不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里占个位置,即起码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就不被看成是真正的男人,这同样是社会化和内化的结果。同时,众多男人在公共领域占有位置利于男人为消除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而联合起来,因为公共领域被看成是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地方。

性别的不平等被提到社会的议事日程上远远晚于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但它终于被提出来了。这是因为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创造了全新的生产方式:家庭不再是生产和生活合一的单位。生产功能从家庭中被剥离出来,全面进入了公共领域。不但男人,妇女和儿童也被推进公共领域充当雇佣劳动力。英国的劳动妇女在早期的工业革命中扮演过特殊的角色。手工业时期的英国棉纺织业并不是以妇女为主,而是被男性手工业技术工人把持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使纺织技术标准化、流水线操作化,使得没有技术的妇女也可以很快掌握。当时一些男性棉纺手工业者坚持把着自己的手艺不进工厂,维持着家庭作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资本家正是通过大量雇佣妇女完成了棉纺工业的“非手艺化”(deskilling)过程,迫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打败了手工业者之后,资本家继续把女工低廉的工资作为压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砝码,结果引起的不是男女工人联合来反抗资本家,而是男工对女工的不满和排斥,以及雇佣妇女为主的资本家对国家限制劳动时间等立法的反对。很多西方观察家都认为,在19世纪早期,纺织女工成了纺织厂持久不衰的、最突出的人格化的形象;而纺织厂几乎成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同义词(Tilly & Scott, 1987)。同时,当妇女走进了公

共领域以后, 性别的不平等就从隐性(invisible)、个人性的, 变成了显性(visible)、社会性的了。

## 二、30年社会主义工业化: 谁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 是工业积累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来进行工业积累和经济发展。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在相当的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高层领导人的意志, 而是受着国内和国际条件、政治经济制度及历史、文化遗产的种种制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呢? 清王朝中后期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和对财富的巨额掠夺, 抗日战争前后的连年内战, 以及国民党在撤往台湾时对黄金、白银的大量转移。据有人认为, 日本在中国掠夺的财富之巨超出人们的想象, 是使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所带走的金银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留下的却是大陆战后的废墟。试想, 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哪一个在它们资本主义工业起步和初期发展的时候是这种情况? 一个也没有。

新中国的领导人对发展现代民族工业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中国要想不再受屈辱, 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如没有能力建立现代化, 新生政权就不能巩固。那么, 工业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 工业积累如何获得? 这是当时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靠发展资本主义和私有经济吗? 这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奋斗20年的目标就是想通过另一条道路建设中国, 即较小的贫富差别和较平等的分配。再说它所建立的非市场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也无法发展资本主义。那么, 靠吸引国外的资金吗? 就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和现在的中国所做的那样? 这在当时也不可能。从50年代到80年代冷战结束以前,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 只能从很少数的国家得到有限的经济援助。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吗? 没有了, 除了靠自己国家的内部积累。

“内部积累”(internal accumulation)这个概念最先由英法一些学者提出来(Feher, Heher & Markus, 1985; Riskin, 1987; Prime, 1989; Meisner, 1996)。它是讲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有共性的工业发展的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启动资金和后来的工业积累不仅仅是靠手工业的积累和剥削本国劳动者, 掠夺殖民地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和在其他国家建立倾销产品的市场才是工业积累真正的大头。这里只举几个现代的例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产草莓。资本家嫌国内的劳动力价格高, 就在墨西哥找了和加州气候、地理环境相似的地方雇佣当地的工人种草莓。在美国, 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4.5美元。而在这些庄园里, 一个女工做整整一天才挣5美元(Arizpe & Aranda, 1986)。人们说, 墨西哥简直就像美国一个最便宜的加工厂。80年代中, 香港雇佣一个工业企业工人的月薪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2000多元, 但是在中国大陆, 300人民币就能雇一个女工(赵建华, 1992)。墨西哥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香港已回归中国。在帝国主义时代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如今已经全部脱离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 但是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已从过去的殖民地集聚了大量的财富, 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资本、加工和销售市场。可以说, 整个世界都是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基地。我们称这种方式为“外部积累”。对照之下, 可以想像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内部积累”是多么有限和艰难了。

国家工业化格局的蓝图也加大了工业积累的难度。中国决不甘心民族工业只做西方超级大国的加工厂。建立一个钢铁、煤炭、机械、交通、国防和轻工业俱全的工业体系是共产党的雄

心所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艰苦奋斗尽管代价巨大,但毕竟搭起了一个基本的工业框架。但同时,这种工业格局使得对资本积累的饥渴和国内资源的实际情况更加不对称。

所谓“内部积累”其实就是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干得多一些,消费得少一些。总体来说,五六十年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比较低,都在为工业积累做贡献。有人说,共产党成功地分配了“贫困”。“成功”大概就是指把贫困比较均等地分配给了老百姓吧。但是,事实上社会群体之间并不平等,某种社会身份的人被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这就是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把农民作为内部积累的主要对象,就是因为农业和农民的劳动力在当时是最可以利用的资源。但是这样做要有一定的理由,这个理由是通过建立国家意识形态来完成的。这种意识形态告诉人们:民族工业化代表了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任何个人和群体都要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来服从这个整体利益。第二,农民与工人不同,他们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每日每时都在产生小资产阶级”,因而他们是需要被改造的。当国家侵害农民的利益时,这就成了为国家政策辩护的理由。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得十分清楚。搞统购统销时党内有不同意见,认为把农民搞得太苦。一位党的领导人说:“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贡献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接着,这位领导人批评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这一大的实际需要。”(薄一波,1991,281)

社会主义时期所有的社会改造运动和重大决策都和工业积累和经济发展战略有直接的关系。比如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

徐勇在《包产到户沉浮录》一书中讲到,从农业合作化的那一天起直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实行之前,包工包产,包产到人、到户、到组的实践在不少地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不仅是农民自己的冒险选择,从中央最高领导到地方的最基层干部都有人赞同和支持,而且多次上书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在1961年对当时的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你们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徐勇,1998,98)遗憾的是,自合作化以来近30年的时间,一次次已经看到效果的努力都被否决和批判,毛泽东自己也出尔反尔,不认帐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一直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被多次带上右倾的帽子。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他的实事求是关系。他说“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这话仍能看出他讲究实际的作风。像毛泽东这样思想精深的领袖不会不明白,把人们置于相同的经济条件和地位来迫使人们平等,既不公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就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家里劳动力少的,有老弱病残的,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有三四个壮劳力的人家。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应该靠政府对机会的调剂和通过税收对生产和生活资料进行再分配来实现。如果一个试验区一年能增产十亿斤粮食,农民生活普遍提高,生产大队又有公益金补助困难户,何乐而不为呢?毛泽东不肯这样做,是不是还有更深、更实际的政治功利和经济功利的考虑呢?我相信,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我认为,不愿意放弃人民公社这一有效的控制农业资源和农民劳动力的组织形式,从而使农业剩余价值能畅通无阻地从农村流向城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查一下过去的政府文件、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和专业工作者的著作的话,我们会发现无数的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正确安排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的论述。马寅初在他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几乎通篇都是讲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规律(1980年,再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

有很好的论述。但在这些书、文发表的同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 1952 年至 1956 年，我国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大约增加三十多亿。扣除小量的储备和每年人口增长所消费的部分，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1957 年 6 月 26 日，单行本，29）马寅初提出了理论，毛泽东确定了原则，周恩来指出了事实。很显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可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因为对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的不足。投资不足的原因是因为资金的大头流向了重工业。理论和原则都无法改变实践中的投资取向，这是因为，就算国家有十二分的诚心，国家所确立的制度与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原则是相抵触的，而国家又不愿意放弃这些制度。除了前面提到的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还有就是城乡二元化。如果不是城乡隔离使农民不真正明白自己的实际地位，这种资本积累也不会那么顺利地完成。在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训时，人们经常谈到“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抹杀了人们之间能力的不同，抑制了竞争的积极性。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平均主义”在当时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即减少或缓解人民对贫困的不满：大家都相对贫困，于是谁也不怨谁了。可这仍然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种平均主义是不同社会群体内的平均主义，而社会群体之间又被隔离开来。比如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隔离。60 年代中后期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中有多少人被农民的贫困所震撼。这就是看到了“隔离的平均主义”所带来的撞击。

### 三、内部积累下的农村妇女：看不见的剩余价值

人民公社时期，动员大量妇女参加生产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步骤。这里固然有解放妇女的意图，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劳动力的投入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公社来讲，都是积累的主要来源。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范围的内部积累中的“子内部积累”。所谓“子内部积累”是说，为了对付国家对农业剩余价值的超量提取，生产大队不得不把眼睛转向本社区内的某一部分群体，以便在普遍比较低的工分分配中，再压低这一部分人的工分。妇女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目标。人民公社时期的普遍的做法是男劳力一个工 10 分，女劳力 7 分。很多人都认为这很公平，因为男人力气大，干得多，多劳多得。但并不是所有的活儿都靠力气大。1993 年到 1997 年我在锡山（原无锡县）的一个村做调查时，村里的男人就跟我说过，插秧这活儿很多女人比男人干得又快又好，可是女人还是 7 分。这种做法也在社队企业中实行起来。70 年代早期，这个村的大队建了三个厂子：拉链厂、服装厂和编织厂，主要招收女工。大队把男女工分比例照搬到厂里，女工只挣男工 70% 的工资。当现在的村党支部书记给我介绍这个情况时，他直率地对我说：“我们当年这样做也是考虑到资金的积累。女工便宜一些嘛。”既然国家通过剥夺农民来进行“内部积累”，它就不能不宽容农村社区通过压低妇女的工资来进行“子内部积累”。20 年以后，这个村建立了 36 家企业。1994 年我采访其中的一个厂长时，他告诉我，他决定把实行了 12 年的女工挣男工 70% 工资的制度改掉，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他没有向我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但我想有一点是清楚的，当基本上度过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后，他有可能，也愿意考虑和他有着血地缘联系的本村女工的利益了。

农村妇女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对经济发展和对自身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能被抹杀的。问题是，由于国家把工业积累和经济发展看成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因而创造了一套价值体系，试图使人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集体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都高于家庭、个人和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这样一来，妇女的家务劳动和生育就被看成私人领域里的属于家庭和个人

的事情,因而被贬值。而只有当她们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时,她们才被赞扬。1993年我在河北涿州的一个村子调查时,采访了一个1918年出生的妇女。除了在大跃进时期不得不到队里干了几个月的活儿,她一辈子也没有下过地,一辈子都在生养孩子和做家务。1958年,她的第九个孩子要生产了,可是却一个帮手也没有,连村里的产婆也找不到。所有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和女亲属们,都卷入了热火朝天的生产竞赛。她只好自己接生。她忍受着宫缩的疼痛给自己准备所有的东西:热水、剪刀、垫子,还给自己煮了几个鸡蛋,好在生产的时候有力气。我问:“疼吧?”她说:“不疼,就是腰酸得厉害,像要断了似的,我就知道该生了。我把几床被子摞起来,靠在上面。一定不能躺着,躺着使不上劲。”她还告诉我,其实生孩子不难,最后几个孩子都是她自己生的,说着还做了几个剪脐带和结扎的动作。那天傍晚她丈夫收工回到家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孩子生出来了。给我做碗粥吧。”把要临产的妇女一个人留家里无人照料,那些出去参加生产竞赛的人一定是出于极大的劳动热情或精神压力,或者这两者的混合。对比之下,家里的事、生孩子的事是多么渺小,一个妇女和她将要诞生的孩子的生命是多么微不足道。50年代的中国,生养一个劳动力是多么便宜。劳动力是社会的财富,生养孩子却是私人的事情。这个妇女一辈子生养了11个孩子,创造了11个廉价的劳动力,为国家的工业积累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是有谁真的看重这个从来不下地干活的妇女呢?

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不总是被鼓励,而是取决于发展的需要和劳动力供求的情况。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国家就会鼓励妇女回家做“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说法。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两个界限分明的概念,前者是指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以及这个领域里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后者是指个人家庭领域及家庭内的各种活动。生育和培养劳动力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头等大事。在人类早期这是氏族社区的事务;私有制产生以后便成了家庭内部的事情。在现代社会,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训练方面的大部分事务已主要由公共领域来承担。但是衣食住行、日常家务劳动等维持劳动力的体力和健康还基本上是私人领域的事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把公共领域的地位推到了最高点,相形之下私人领域的劳动不被看重。提出做“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是让妇女安心在家里不要抱怨,另外国家也确实认识到,妇女的勤俭持家、精心安排有限的收入,对稳定人民的劳动热情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农民不会因为冠于“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就对自己失业的女人加以赞赏。60年代初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无锡县的一些生产队劳动力过剩,于是队里要求妇女全回家,男劳力轮流出工(莫远人,1987,117)。妇女在家没有闲着,她们种自留地、养猪,从事其它家庭副业。从这里面得到的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把“家”和“国”看成是从属者和凌驾于从属者的关系,因而家务劳动和从事家务的劳动妇女也被置于从属的地位。

也许有人会说,家务劳动不起眼是因为它不为国家创造剩余价值。这是不对的。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被掩盖了。60年代初的美国和西欧研究妇女问题的学者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Benson, 1969; Morton, 1970; Secombe, 1974)。讨论中有人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妇女到一个生活宽裕的人家当管家,靠挣来的工资养家糊口。在人们的限里,她是自食其力的养家人和纳税人。后来,这家的男主人娶了这个女人为妻。这个女人还当她的管家,做和从前一样的事。除了从公共领域转到私人领域的变化之外,这个女人劳动的总体价值并没有变。但在人们的眼里,她已经不再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养家人,而是一个靠丈夫养着的女人。

讨论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不是产生剩余价值,就要谈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工资理论。工资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计算不是根据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的成本价值,而是维持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再生产新的劳动力——即养家糊口和养育孩子——所需的费用。问题是,用于购买日常生活食品的工资里缺少了重要的一项。就是说,很多食物不是买回来就可以吃的,必须要弄干净、烧煮以后才能吃。为什么在餐馆吃同样的菜就贵很多?除了利润,也因为价格里包括了这部分劳动成本。可是,妇女在家里做的完全相同的劳动却变成了无偿的了。仅这一项,一年贡献多少剩余价值?又有多少人真正褒奖这种贡献?即使褒奖了,对妇女在公共领域里的实际地位又有多少提高?1994年在锡山农村,我曾问过一位50多岁的妇女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日常家务劳动都是些什么。她说,除了每天做饭、挑水、洗衣、清洁和照顾孩子外,她还要做以下的事情:(1)给她所有的孩子做鞋。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她从来没有到商店里给孩子买过鞋;(2)给孩子和公婆做衣服;(3)每年给全家拆洗被褥和棉袄;(4)给全家所有成员织毛衣;(5)种自留地;(6)割草晒干后卖掉,一百斤5元;(7)纺线,一公斤1.2元。这七项中除了第三项,其他的都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劳动,只不过是家庭的、手工的。可以说,没有这位妇女的这些劳动,这个家就无法生存。但是,当国家对农业剩余价值的提取加重时,往往伴随着强调对国家做贡献的重要性和对农业集体生产的重视。为此,妇女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从事家庭生产劳动以补充生活资源的不足,尽管她们的劳动价值在公共领域里的人看来是起眼的,被贬值的。说句实在的话,如果没有妇女的这些劳动,人民公社撑不到80年代初。

妇女的生育同样受着“内部积累”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定的影响。说国家在50年代对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对这种看法我不完全赞成,至少认识不足不是主要原因。我国著名经济学、人口学家马寅初在1955年就撰写了《新人口论》的发言稿。待时机成熟后,1957年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马寅初,1980,143—166)。同年7月5日他的发言被全文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三个多月之后,1957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0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第29条第3项)这说明,至少在当时,马寅初的主张是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的。

马寅初认为,我国当时“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的似乎太慢。”(1980,145)1956年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是79%对21%。这个比例比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高的了。但马寅初认为,“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因而他说:“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1980,146)

如果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增加积累的办法,为什么毛泽东反对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从短期效应来看,到底是不节制生育还是节制生育能更快增加积累呢?当廉价劳动力是积累的重要源泉时,保持一个庞大的人口未必不是一个办法。毛泽东在大跃进时说,人多力量大,热情足,干劲高,大概是有其深义的。国家要加大资本积累的力度,又不能让农民活不下去,就只能宽容农民对生儿子的渴望。我认为,这是国家没有能够在共和国的早期就对人口及时进行控制的根本原因。同时,农民对国家征购粮食所感到的压力越大,男性家族对妇女生儿子的压力也就越大。妇女生儿子的愿望越强烈,她们对父系、从夫居婚姻的依赖就越强。但是,这么多的人口,不搞节制生育终究是要出问题的。而到了不搞计划生育就要威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时,节育问题就成了“妇女问题”。其实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男人问题”。当然男人女人都要

儿子，但在农村作主的是男人和男人的家族，而直接承受压力的是妇女，她们承受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和责难——执行政策者和她们的男人。

#### 四、争取空间：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重要的发展战略的转变。7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创建了被称为“规则学派”(regulation school)的理论，主要研究是什么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世界能够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致命的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中得以生存，并能够继续发展壮大。经济大萧条时期，不少西方的共产党人都相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将要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机制就是无止境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到了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关头，资本家也明白了如果不想毁灭，就只有改革现行体制。

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资本积累模式，该学派称其为“积累政体”(regime of accumulation)，说明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模式，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和结构的总和。Aglietta(1979)和Graham(1991)认为，一个积累政体的结构包括投资与消费、资本与劳动等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它反映了工资关系和生产的组织形式。而这种工资关系、组织形式又伴随着一定模式的工业体系。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美国的“积累政体”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从剥夺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的扩张性积累”到“相对剩余价值的深入性积累”。也就是说，由于把工资压得太低，工人没有能力消费，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想使经济继续发展，使资本主义不灭亡，就要提高工薪阶层的劳动力价值和消费水平。西方有大量文献讨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它稳定社会的角色和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口数量相当大的中产阶级挽救了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是中等偏高产品的重要稳定的消费群体。同时，它的存在给较低阶层的人们带来了向上攀升的希望。因为从理论上讲，人人都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达到跻身于中产阶级的愿望。但因为竞争激烈，实际得到这种机会的人比理论上的要少。

中国的积累模式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但是其政治和经济背景不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积累不是由众多个体资本家来完成的，而是由国家扮演一个“集体资本家”的角色来推动资本积累(Meisner, 1996)。有人用另外一种表述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可以定义为“建立在通过剥削工资劳动来获得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Tucker, 1969, 42)。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应被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Ulam, 1964)。上述两种说法是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建立了一个特殊的阶级结构，使得权力集中的国家机构以民族利益的合法代表者的身份扮演了剥削者的角色，向农民要求农业资源和廉价劳动来进行资本积累。

对这种积累模式作政治评说和道德评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这里只想简单地谈三点。第一，这种积累模式对农民来讲是剥削性质的，这一点没有疑问；第二，农民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律渠道来和国家进行民主对话，因而，这种剥削是无法抗拒的。同时，也不否认国家对自己的失误作过调整，比如1962年“农业六十条”的制定；第三，当年共产党的清廉是现在所不能比的。所积累的资金按计划应该用在工业发展上的，除了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基本上没有流失。

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旧的积累模式的效率越来越低，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二，过去所获得的工业积累已经基本上搭起了一个民族工业体系的框架，使得在调

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时,重工业有能力为消费工业提供生产机械。可以说,如果没有 50 年代到 70 年代建立起来的比较成形的工业体系,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不会有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奇迹。尽管这个代价是巨大的。

中国也同样走了一个从绝对剩余价值的扩张性积累到相对剩余价值的深入性积累的转变过程。相应的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从国家垄断发展大权、直接控制绝大部分的资源,到下放发展空间、放松对资源的控制,让农民和其他类型的经济群体有自己发展和直接获益的机会。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同时改变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工业化第一次成为有实在意义的、激动人心的词汇。就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象“一夜之间出现的奇迹”(Byrd & Lin, 1990)。那么,这个奇迹对农村妇女意味着什么呢?

## 五、社区劳动力市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设置: 农村妇女的得与失

“社区(工业)劳动力市场”是本文特别要强调的概念。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设置,对农村妇女的就业尤其意义重大。这种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后者是开放的,原则上不对任何社会群体作特殊的保护,其目的是通过公开的、冷酷的竞争发现最需要的人才。在这种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主和受雇者本质上都是抽象的:前者是资本的化身,后者是生产成本的化身。

中国农村的社区劳动力市场则不同。这种市场建立在农村深厚的血地缘关系的基础上,以吸收本社区的村民作为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成分,并保护他们不受外界市场竞争的威胁。在这种前提下,企业厂长和工人都是比较具体的:在厂长眼里,一个就业的妇女既是生产力,也是村里某人的媳妇、母亲、嫂子等。厂长不能完全不在乎这种关系。同样,厂长在妇女的眼睛里也不简单地就是她们的老板,而同时还是某人的父亲、丈夫和儿子。这就使得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外,多了一层根基深厚的人情关系。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从社会和文化两方面来讲,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强壮的家庭纽带和家庭投资的社会网络。除了家庭,以村为单位的社区组成了中国农民的最基本的认同。保卫和推动社区的共同富裕是人们认同自己和保护自己的行为。”(Lin & Lai, 1994, 13)

这种社区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它自己的特殊的就业渠道和方法。至少在早期,隶属关系和就业者的教育、技术背景是两个旗鼓相当的就业条件。前者甚至更重要,因为真正素质高的人在一个村里是有限的。亲属关系和个人素质都是重要的资源。男人可能较多地占有后者,但妇女对前者的占有不比男人差。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通过亲属关系就业对多数妇女来讲比通过技术和教育的竞争更人道、更公平一些。就是在苏南这样的文化普及程度比内地高的地方,妇女的素质仍然和农村工业发展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如果以教育和技术背景来决定她们的就业,就等于剥夺了她们的机会——不光是就业的机会,还有实践、学习和个人发展的机会。

“家族关系”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词典里一直是一个贬义词,它和培植某一群体的势力、和拉关系走后门相连。说通过亲属关系就业是不公平的,这当然有道理。因为亲属关系也是一种资源,人和人对这方面的占有生来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在当今的世界里,没有一种就业方式是真正公平的。在自由劳动力市场上凭本事竞争可以说是最公平了吧,但一

个出生在贫困地区的聪明的、却无法受到良好教育的穷孩子，能和一个出生在大都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在重点学校就读的同样聪明的孩子去“公平”地竞争吗？出身也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从来没有被公平地占有和分配过。

我们过去对旧中国的宗法社会有很多批判，那是因为“阶级”这个要素在宗法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被看得非常突出。构成旧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要素有四个：阶级、家族、辈分和性别。也就是说，经济实力最强、家族支系最大、辈分高的男性，最有可能获得权力。传统的婚姻是父系制和从夫居，女人出嫁后是外人，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不在政治权力中占有位置。但是她们也在丈夫的家族和村子里受到保护和分享生活资料，前提是尽到了为人妻、做人母的责任。这个责任是由男性社会来定义，女人自己来内化的。从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群体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形式，其共同利益和群体意识、社区意识都最为明显。如果从近年来讨论较多的“国家与（民间）社会”（state-society）理论来看，这种以血地缘为基础的社区对农民有更为积极的意义。民间社会是指一个不被国家权力直接控制的、各阶层百姓自行从事非官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社会领域。其存在的重要性之一是能够使老百姓对国家不合理的、过分的要求和控制有抗争的余地（Huang 1985；Wakeman, 1991, 1993）。可以说，中国农村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社区在一定意义上是农民与国家对话的基地。

当然，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区劳动力市场也有它的负面影响。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家族势力的大小是影响社区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分层不是性别中立主义的，它对女人和男人并不一律平等，对有势力的男人的女性亲属和没有势力的男人的女性亲属也不一律对待。妇女的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通过她们的男人的身份来体现。在我所调查的村里，几乎没有例外，厂长任命自己的妻子掌管仓库和食堂，让自己的女儿当会计，儿子当车间主任，把推销的肥缺留给自己的兄弟。厂长的直系亲属得到的这些职务反映了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和对他们的前途的期待：厂长的妻子在厂里的工作很像她的家庭责任的翻版；女儿得到的工作常常比她母亲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术，父母期望女儿有更好的教育并不是“望女成凤”，而是希望她能在未来的丈夫家里成为能干的管家，并能辅佐丈夫的事业；给儿子的职务清楚地显示了子继父业的梦想——培养一个老板和一个养家人。

乡镇企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很多学者也都研究过。一般的看法是，在那些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社区管理比较强壮的地方，以血地缘为基础的农村企业有一种调节生产关系的内部机制。这种机制的基础就是“企业动机社区化”，即企业家对个人利润的追求融入职工利益和社区发展（邱继成，1988），或者说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者的制约。还有人认为，不管一个农村企业是集体所有还是私人所有，它都和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公司不一样。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公司里，劳动者是生产要素，工人很容易被新补充进来的劳动力所取代。除了经理们，工人的工资和企业的效益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农村工业中的很多例子证明，工人对工厂的认同以及工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乡镇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一（Gelb, 1990）。

对锡山那个村从 1993 年到 1999 年的观察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深入和复杂的认识。我的问题是，在“血地缘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两者中，哪一个要素更为关键？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锡山村一级的企业在 1994 年和 1997 年经历了两次企业产权所有制的改革。两次改革对妇女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我调查的那个村有 36 家企业，1994 年 9 家集体企业转成了私有制。可是当时很多本地妇女对此并不在意，她们对我说：“所有制无所谓，我们就看两条：第一，

厂长是不是有气量；第二，工资好不好。”我所做的175户的问卷调查也证明了这种看法是个普遍的现象。问卷中有一项是让填写人指出自己所在厂的所有制形式，但这一项的填写错误最多。开始我还一个一个问卷地纠正，后来干脆把这个问题从问卷里取消了。我想，既然妇女们连所有制这么重要的问题都搞不清，说明这个问题对她们并不重要。

我们过去把所有制看成决定剥削与否的关键，却没有认真观察某种所有制的实际内容和其运作的方式。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但没有使农民免于被剥削。而在一个有较强的社区倾向和血地缘认同的村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私有企业厂长的行为。村里妇女们的那番话还说明了，亲属邻里关系比所有制更能决定一个工人在企业中的实际地位。妇女们用“气量大”与否则来判断一个私人企业厂长似乎显得很幼稚，不符合我们从教科书上学的分析规范。其实不然。她们当然知道追求利润是厂长办厂的主要动力，但如果这些妇女对厂长的“个人品德”的在乎超过企业所有制的形式的话，这说明了亲属关系和血地缘认同对厂长和工人的关系有着更重要的影响。

1997年的全面私有化的情况有所不同。那年，这个村所有尚未转制的集体企业都卖给了个人。从党支部开会作决定，到估产、办理手续、签字画押，全部过程一个月就完成了，是少见的高效率。不但过去的集体厂长，就连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成了私有企业的老板。我问村党支部书记为什么这样急着搞私有化，他直截了当他说：“越晚越糟，我是怕集体财产流失得更多。”他还告诉我，这次卖厂的全部资产是2000万元，村里至少得到了这个数，不然，连这个也没有了。

没有了集体企业作对比，企业厂长们便没有了“嫡”“庶”之分，彼此地位一样了。我看了几个厂，当时公开的口号是：“节资降本，加速资本化。”妇女们的话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她们对我说：“苏南模式已经不存在了。我们都清楚，从今以后，只有老板和小工的关系了。”

这个村有过辉煌的时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完全就业。不但妇女，就连一些老人也能在企业里找到看大门的工作。最典型的是前任村妇女主任，近70岁仍在一个厂里做辅助性工作。该厂的厂长对我说：“我们必须照顾她。她到底当过妇女主任。”但是，辉煌的同时是看不见的集体财产的流失。1997年全面转制以后，集体财产不再流失了，就业的辉煌也过去了。除了有过硬的亲属关系的，近50岁的妇女几乎全部从企业里消失。

两年之后，1999年的六月初，我第五次访问了这个村，目的就是看看全面私有化之后有什么变化。我看到至少有五六个新厂房和新设施平地而起，一字在主街两侧排列开来。了解一下，这是村里新的开放政策的结果：允许外村人在这里办厂，并在土地及其他设施的使用费用上和与本村人开的厂一样对待。大部分转制后的私人厂发展势头很好，利润逐年增长，工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也有所增加。但与过去非常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的厂长都采取了大量裁员的政策，裁员量在20%到30%之间。我了解了情况后，认为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我所遇到的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几乎都向我流露了就业的不稳定、不安全感。而我在1994年的问卷调查中，有安全感的妇女高达90%以上。

社区劳动力市场曾经以解决本社区居民的就业为目标。它在性别、年龄和教育、技术水平上都对就业者显示了相当的宽容性。现在的社区劳动力市场仍然优先雇用本社区居民，但它不再那么宽容了，它用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就业者的质量。对企业发展 and 利润的追求，使得厂长们把性别、年龄和教育、技术水平逐渐从有着血地缘关系的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成为考虑对一个劳动力投资是否值得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损失最大的是妇女。由于是女性，父母

从小对她们的投资就不如她们的兄弟。妇女在教育和技术上的缺憾是历史造就的，但逐渐开放和竞争强化的市场是不管历史的，它还是不动声色地把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牺牲了。

可是我发现，无论是厂长、村干部，还是妇女自己，都没有把妇女回家真正当成一件事。原因之一是我和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性别平等观。

“妇女”似乎是个不言自明、无需定义的概念。但这个词在男性农民的头脑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妇女”或多或少是一个抽象的性别群体，她们有着与男人不尽相同的需要和权利。可是，对男性农民来讲，“妇女”从来不是抽象的，她们永远是什么人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永远属于一个家、一个户。如果一个农村女人从来没有结过婚，自己一个人过，那对于男性农民来讲不但不能接受，而且不能想象。对妇女的这种看法导致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观念。1997年当我和该村60年代的村党支部书记交谈时，提到人民公社时期男人挣10分，女人挣7分，并问他是否认为这是个问题。他略微想了一下，然后说：“所有的男人都有老婆，所有的老婆都挣7分。”我迅速地读懂了他的平等公式：所有的妇女都属于某个家庭；所有的妇女都挣女人的工分；所有的男人都挣男人的工分；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情况，因而男人和女人也是平等的。这就是农民的“户的平等”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男女平等是通过“户的平等”来实现的。后来我发现农村到处渗透着这种哲学。1997年转制后，我问一个村领导是否打算解决妇女失业的问题，他说：“这不叫失业，妇女回家还可以种地。”我又提到一部分男人也失了业，他马上说：“男人失业的问题我们是要解决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男性农民捍卫了他们的平等理想和性别等级制。

我还注意到，在一个工业化的村社区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灵活的界线曾经使妇女的就业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为妇女比较容易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同时，我也注意到，两个领域相对紧密的联系也有对妇女不利的一面。当市场萧条的时候，把妇女推回家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容易得多，而且不会像城市下岗工人那样引起社会动荡。引起社会动荡不是一件好事，但它清楚地给政府递送了一个信息：政府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引起社会动荡不是一件坏事，但妇女的声音也就有可能悄然无息，妇女的失业也就有可能被现实化，被社会和妇女自己认可了。

#### 参考文献：

- 薄一波，199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马寅初，1980，《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莫远人，1987，《江苏乡镇企业发展史》，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
- 邱继成，1988，“乡镇企业——社区（政府）管理模式的基本线索”，《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 赵建华，1992，“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山大学出版社。
- 王军，1987，“阜阳地区乡镇企业调查”，《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 徐勇，1998，《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江出版社。
- Aglietta, M.,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 S. Experience*. London, Verso. .
- Arizpe L. & J. Aranda, 1986 “Women’s Works in the Strawberry Agribusiness”, in *Women’s Work*, ed. by E. Leacock & Helen Safa, Bergin & Garrey Publishers, Inc. Massachusetts.
- Benston, M., 196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 Byrd, W. A. & Lin Q., 1990, “China’s Rural Industry: An Introduction”,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d. by W. A. Byrd and Lin Qings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her, F., A. Heber & G. Markus, 1985,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 Gelb, A., 1990 "TVP Workers Incomes Incentives and Attitude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d. by W. A. Byrd and Lin Qings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ham, J., 1991, "Fordism/ Post-Fordism, Marxism/ Post-Marxism; The Second Cultural Divide ? *Rethinking Marxism*, 4: 1(Spring), 39— 58.
- Huang, Philip C. C. , 1985,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 Lin, Nan & G. Lai, 1994,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cal Coordination in Rural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arch, Boston.
- Meisner, M., 1996 *The Deng Xiaoping Era-A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 1994*, Hill and Wang., New York.
- Morton, P., 1970, *Women's Work is Never Done*, Canadian Women's Educational Press, Toronto.
- Prime, P. B., 1989 "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litics of Accumulation in China", i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ed. by A.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M. E. Sharpe, Inc.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 Riskin, C., 1987,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The Questions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Secombe, W., 1974,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r Under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83(Jan. -Feb. ).
- Tilly, L. A. & J. W. Scott, 1987, *Women, Work, and Family*. Methuen, New York & London.
- Tucker, R. C., 1969,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 Norton.
- Ulam, A., 1964,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 Essay on the Sources of Influence of Marx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Vintage.
- Wakeman, F. Jr. , 1991,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939— 1989". In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M. E. Sharpe, Armonk, New York.
- , 1993,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Modern China*, vol. 19.

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 谭 深